

敦煌本《孟兰盆经赞述》两种辨正*

张小艳

《孟兰盆经赞述》是对《佛说孟兰盆经》的随文注疏。该经最早著录于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四,归在“失译杂经录”;后初唐道宣《大唐内典录》卷二将其收入“西晋朝传译佛经录”;盛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二始称其为晋竺法护所译。其经盖为西晋失译,智升把它系于竺法护名下显属误会^①。《孟兰盆经》意在劝勉信徒孝顺父母。经言佛在舍卫国给孤独园中,目连以神通观见其母在饿鬼中受苦,为报答母亲的哺育之恩,遂请佛救拔其母。佛为目连说法,教他在七月十五日僧自恣时置办食饭、五果、盆器、香油、卧具等供养十方僧众,救母脱离饿鬼之苦。目连依此救母脱离苦海。

该经旨在宣传孝道,与儒家重“孝”的传统思想相合。自其翻传以来,流布极广,影响深远。仅有唐一代,就有三位高僧曾为该经作注:一是慧净,二是慧沼,三是宗密。传世藏经中,仅宗密的《孟兰盆经疏》保留下来,其余两家注疏都已亡佚不存。幸运的是,上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六万餘件文献中,保存有两件《孟兰盆经赞述》的写卷,使我们得以窥见其具体的结构与内容,弥足珍贵。

敦煌文献中保存的这两件《孟兰盆经赞述》写本,一件是 P.2269(下称

* 本文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敦煌疑伪经校录并研究”(200712)、复旦大学“985工程”三期人文学科整体推进重大项目“中古中国的知识、信仰与制度的整合研究”阶段性成果。初稿曾提交复旦大学“中古史共同研究班”讨论,蒙各位同仁惠示宝贵意见;后又承梁春胜博士及匿名审稿专家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谨此一并致谢。

①陈允吉:《〈目连变〉故事基型的素材结构与生成时代之推考——以小名“罗卜”问题为中心》,载《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3页。

“法藏本”),首残尾全,尾题“盆经赞述卷一”^①。另一件是上图68号(下称“上图本”),首尾俱全,首题“孟兰盆经赞述 沙门慧净法师制”,尾题“孟兰盆经赞述”,后接抄《温室经疏》,卷末存题记“岁次癸卯四月五日沙门海德写记并堪定(后三字为朱书)”,还附有合肥龚钊甲戌(1934)年跋语:“此义净法师所著《孟兰盆经赞述》一卷、《温室经疏》一卷,末有沙门海德写记等字笺,共九幅。有歙县许际唐于民国初年官甘肃时所得,亦莫高窟中物也。卷经写者朱笔堪定,一字无误。义净著名于唐。此笺纸帘宽近二寸,经亦极疏,字迹有褚、薛意,以各种写经卷比审之,此当是中晚唐人手笔,在石晋癸卯前也。藏外秘籍完整如新,良可宝贵。许太史质于黄朴存处,黄为余作介得之……甲戌上元日合肥龚钊识。”^②谓该经原为许承尧官甘肃时所得,后因其质于黄朴存处,由黄作中介,龚钊方得收藏。跋语中,龚钊将“慧净”误作了“义净”。此件题记中的“癸卯年”,日本学者池田温比定为公元883年^③,可从。

法藏本《赞述》很早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上世纪30年代,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时将其收入古逸部,题“唐慧净撰”^④。陈祚龙也认为此卷乃初唐纪国寺上座慧净所撰,并将典籍中有关慧净的资料辑为一编^⑤。太史文据《大正藏》所载录文,对慧净的生平及其撰《赞述》的时间作了考证,就其内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孟兰盆经》现存最早的经疏由长安名僧慧净(578-约645年)所著,可能作于636-639年间;该书在解释标题的含义及佛经的结构之后,开始逐句注疏;慧净几无例外地利用佛教藏经来解释孝顺的观念,引用《阿含》、《涅槃经》及《大智度论》来助证^⑥。对于法藏本的撰者问题,

①关于该卷字体、墨色、款式、行数、上下边缘尺寸、全卷长度的描述,参谢和耐(J.Gernet)、吴其昱(Wu Chiyu)主编:《敦煌汉文写本目录》(Catalogue d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Fonds Pelliot chinois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第一卷,巴黎国立图书馆,1970年,第173页。图版载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0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90-293页。

②吴织、胡群耘:《上海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目录(续)——附传世本写经及日本古写本》,《敦煌学研究》1986年第3期,第90页。余欣:《搜奇癖古入肝膈:许承尧旧藏敦煌文献的调查与研究》,载《博望鸣沙——中古写本研究与现代中国学术史之会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0页。图版载上海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2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90-195页。

③(日)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435页。

④(日)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85卷,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年,第540-543页。

⑤陈祚龙:《释慧净之生平与著作的参考资料小集——敦煌古抄内典杂记之一》,载《敦煌学园零拾》(下),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08-641页。

⑥(美)太史文著、侯旭东译:《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5-57页。

方广钊比较审慎,他指出:P.2269《赞述》的作者不详。《注进法相宗章疏》、《西域传灯目录》等谓唐慧沼、慧净曾各撰《孟兰盆经赞述》一卷,故疑此《赞述》即其中一人所作。若此推断成立,则此卷是现存关于《孟兰盆经》的最早注疏^①。

上图本《赞述》公布较晚,研究者着意不多。该卷题为“沙门慧净法师制”,说明其撰者是慧净,但荒见泰史却对此提出了怀疑。他仔细研读比较了法藏本与上图本后,认为两件写本是不同的系统,两者之间有不少差异。虽然上图本明确写有《孟兰盆经赞述》的书名与慧净的撰者名,但内容不像是初唐时期慧净所撰,其内容受到9世纪文书的影响,此书是9世纪中叶以后被改写过的文献。《赞述》中引用了很多其它的经典注释书,其中关系最多的是宗密(780-841)的《孟兰盆经疏》。上图本《赞述》的内容很多摘抄自其中,简直就是《孟兰盆经疏》的节略本一样。若上图本出自慧净之手,按佛经目录的记载来判断,就应是《赞述》在先,宗密的《疏》在后,因为慧净的歿年比宗密的出生年代还要早得多,应该是《疏》援引《赞述》才对。宗密的《疏》中所载“义净三藏云”一句,明显指出其中引用了义净(635-713)的话。义净生活的年代晚于慧净,慧净歿年义净才10岁左右。因此,上图本《赞述》不可能是慧净所作,而是有人假托其名在宗密《疏》的基础上改编而成^②。

季爱民对敦煌本中现存的两种《赞述》进行了比较,指出:上图本《赞述》就是慧净对《孟兰盆经》作的注疏,其中第一次提到目连及其母亲的名字分别为罗卜和清提,这使故事显得具体;书中还构造了丰富的故事内容,利用夸张、对比等手法表现跌宕起伏的情节,注疏语言生动雅致,与慧净的其它著述颇为一致。法藏本《赞述》反映了玄奘新译佛典的直接影响,采用了新的专有名词、注疏结构。两种注疏都融入了儒家孝道的伦理观念^③。

不难看出,学界对两种《赞述》的研究在结构、内容以及注疏风格上都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但在撰者问题上却存有一定的分歧:法藏本,多以为是慧

①季羨林主编:《敦煌学大辞典》方广钊撰“孟兰盆经赞述”条,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年,第672页。

②荒见泰史:《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中华书局,2010年,第43-48页。

③季爱民:《初唐长安宗教宣传与国家寺观命名的儒家化趋向》,《古代文明》2012年第3期,第59-60页。按:关于目连小名“罗卜”及目连变的故事基型,陈允吉指出:梁武帝天监十七年(518)僧伽婆罗译《文殊师利问经》中把目连的梵文(maudgalyāyana)汉译成“莱茯根”,而此经《碓砂藏》本卷上之《序品》“大目犍连”名下附注云:“此言罗茯根,其父好啖此物,因以为名。”“莱茯”“罗茯”与“罗卜”为同词异写,故“罗卜”实为“目连”梵文的汉译。由此联系“孟兰盆会”风行于梁代和中古孝道思想盛行的佛教史、社会生活史,从而推定目连变的故事基型当生成于萧梁时期。参陈允吉:《〈目连变〉故事基型的素材结构与生成时代之推考——以小名“罗卜”问题为中心》,载《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第157-182页。陈氏此说蒙张金耀先生教示,谨致谢忱。

净所撰,唯方广钊认为作者“不详”,可能是慧沼、慧净中的一人;上图本,大都依写本首题定为慧净所著,仅荒见泰史认为是后人假托其名在宗密《疏》的基础上删改而成。那么,两种《赞述》的撰者究竟是谁?上图本《赞述》与宗密《疏》之间又是怎样的关系?本文拟结合传世文献中相关的记载及敦煌本两种《赞述》在结构、内容、用语、风格上的特点,尝试对此作答。

二

确如荒见泰史、季爱民所言,法藏本与上图本《赞述》是两种不同的注疏。总的看来,两者在注疏体例及突显“孝道”思想上大体一致,都是先释“经题”,然后以“经曰”“述曰”的形式逐句引经注疏;疏解经文时,先阐述经文的行文结构,再疏解经文词语的含义及其由来。而在疏解经文的过程中,其行文的风格、内容的繁简、专名用语的使用皆表现出极大的差别:上图本用语简明扼要,行文以四六骈文为主,文意绵密,绮丽典雅,读来音韵铿锵,对仗工整,富有节奏感;法藏本用语新奇,疏解经文结构的术语及音译名词多用“新”词,解说经意常引其它佛典来证义,不避繁复。兹举例说明如下:

文风上,如对“目连悲哀”的疏释,上图本云:“此摧恻也。哀哀父母,生我劳悴,一朝弃背,落此幽途,所以感激彻于骨髓,号叫动于天地。”(49-50行)法藏本曰:“此痛苦也。哀哉父母,爱育劬劳!一旦永摧,沉沦(沦)恶道。目连虽不灭姓(性),痛彻心肝,悲涕横流,哀声动地,故云‘悲哀’也。”(105-107行)又如对“即钵成(盛)饭,往饷其母”的疏释,上图本云:“此报恩也。母既气绝夕漏,厄在朝饥,救急之重,甘鲜为切,所以贮香餐于法器,申孝养于冥道,圣力所资,故能尔也。”(50-52行)法藏本曰:“往救也。母既皮骨连立,绝食已经多年,子即感结良深,遂将食往救也。”(108-109行)又如对“非汝一人力所奈何”的疏释,上图本云:“此即第二明子德薄也。汝虽术穷三变,恩行四等,以母罪根深固,所以难动难拔,故曰‘非汝一人力所奈何’。”(65-66行)法藏本曰:“第二子独无救也。目连持食往饷,冀得口腹充盈,欲显苦报难除,非汝一人能救也。”(122-124行)两相比对,前者“典雅”而后者“平实”。

用语上,如在“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一句下,两种《赞述》都对经文结构作了阐述。上图本云:“三分二序,不异常谈;文势起尽,临章别断。”(14-15行)法藏本曰:“此经三分:一教起因缘分;二目连大叫,下明圣教所说分;三目连白佛言,下明依教奉行分。明教起所因所缘,故释教起因缘分;正显圣教所说法门品类差别,故云圣教所说分;显彼时众闻佛所说欢喜奉行,故名依教奉行分。若依旧解,名序、正、流通,与新经论三分不异。”(12-16行)“三分”指佛经在行文结构上多分为序分、正宗分、流通分三部分,“二序”谓“序”又分作“通序”和“别序”两种,前者“证信”,后者“发起”。上图本认为“三分二序”有如“常谈”,人所共知,不必繁述,所用乃传统常用的术语。而法藏本所用则是一套全新的术语,称“序分”为“教起因缘”,“正宗分”为“圣

教所说”，“流通分”为“依教奉行”，此乃“新经论”的三分。又如在疏解“舍卫国耆树给孤独园”时，法藏本先按传统的说法解释：“‘舍卫国’者，此云名物国，以彼国中积有余物，多有异珍，既名振遐邦，声流远国，即为名也。‘祇树’者即祇陀也，此云战胜，即太子名也。‘给孤独’者，此云须达，即是国臣之号。”（48-51行）然后又特别指出：“若依今日三藏法师新经及论云‘室罗伐誓多林给孤独园’。良以旧来三藏不善方音，遂置（致）讹谬。若具梵本，应言‘室罗伐悉底国’，略去悉底也，唐云名闻国。”（51-53行）这里提到的“三藏法师”即玄奘（详下文），其译经讲求准确，故在其新译的经、论中，“舍卫”皆译作“室罗伐”，据梵本按音对译则当作“室罗伐悉底”，省去“悉底”便是“室罗伐”。可见，在音译用词及分析结构的术语上，上图本多用传统的旧译或说法，而法藏本则喜用玄奘新译经、论中的用词和术语。

引经上，上图本极少引用他经，偶一援用，则多为经典常谈，如对“若一切佛弟子应当奉持是法”的疏释为：“此教奉持也。奉者助其信力，持者助其念力，故《智度论》云：信力故受，念力故持也。”（127-129行）所引《智度论》文句，源自姚秦鸠摩罗什译《大智度论》卷五六。上图本引经简明扼要，与疏文配合密切。与此相比，法藏本援经较多，引文繁复，所引佛经有《佛地经论》、《维摩诘所说经》、《阿含经》、《涅槃经》、《末罗经》、《智度论》等。从引经频率看，法藏本对《佛地论》尤为青睐，仅在释“经题”及“序分”部分就引了四次来助证经义。《佛地论》乃玄奘所译《佛地经论》的简称，据唐智升《开元释教录》卷八，该论乃亲光菩萨所造，由玄奘于贞观二十三年（649）十月三日至十一月二十四日于大慈恩寺翻经院译出。法藏本也较重视对经文中“孝道”的阐释，如疏解“欲度父母，报乳哺之恩”时，连续引用《阿含经》、《涅槃经》、《末罗经》、《智度论》、《中阴经》等五种佛经中与“父母恩重，是须孝顺”相关的经文来证义，藉此突显佛典中自来就看重“孝道”。另，法藏本援引的经文与源出经典的字句并不完全相同，不少内容乃撰者据己意增改的，如所引《佛地论》中对“经”的解释，即将玄奘译经中“应知此中宣说佛地”的“佛地”随文意改成了“兰盆拔苦孝行”，将“名《佛地经》”换作“故名为‘经’”；所引《涅槃经》中“以钻其身”“何以故？父母恩重故”、《末罗经》中“母怀子十月，如负太山之重”“号天罔报”、《智度论》中“三年之内，在母怀抱，推干去湿（湿），以爱子故，血变为乳而养育之”等内容都是源经所没有的，乃撰者新增。可见，法藏本《赞述》喜引经证义，所引经文或经撰者增改。引经偏重于玄奘译《佛地论》，也着意突出佛教对“孝道”的重视。

由上面的举例论述可知，上图本与法藏本在行文风格、用语新旧、引经证义等方面存在极大的不同，这种不同恐怕只能用两种《赞述》由不同撰者所著来解释。如前所论，上图本《赞述》明确题为“沙门慧净法师制”，其后接抄的《温室经疏》下也题作“慧净法师制”。另，S.2497《温室经疏》卷末也题为“释惠净撰”，“慧”、“惠”二字在古籍中常相通，故“惠净”即“慧净”。慧净为

唐京师纪国寺上座,《续高僧传》卷三称其“忘身为法。又撰《法华经赞述》十卷,《胜鬘》、《仁王》、《般若》、《温室》、《孟兰盆》、《上下生》各出要纘,盛行于世,并文义绮密,高彦推之。故其每有弘通,光扬佛日,缙素云踊,庆所洽闻。于时大法广弘,充溢天壤,颇亦净之功也”^①。道宣谓其疏“文义绮密”,上图本《赞述》文辞绮丽典雅便是最好的证明。日本平祚录《法相宗章疏》中载有“孟兰盆经疏一卷(慧净述)”,说明此书曾流传到日本。综合上述写本题名、《续高僧传》及《法相宗章疏》所载慧净撰有《孟兰盆经疏》来看,上图本《赞述》毫无疑问就是慧净所撰。

既然上图本《赞述》乃慧净所作,而法藏本与之又有极大的差异,则其撰者自不可能是慧净。那么,是否如方广钊所言,可能是慧沼呢?日本藏俊撰《注进法相宗章疏》载“孟兰盆经疏一卷,大云寺惠沼;同经疏一卷,慧净撰”;又永超集《东域传灯目录》中也载有“孟兰盆经疏一卷(三十三纸,吉藏);同经疏一卷(云赞述,惠净述);同经疏一卷(惠沼撰出,传见传法院本《劝发心集》,云赞述)。由此记载可知,唐代除慧净撰有《孟兰盆经赞述》外,大云寺僧惠沼也曾为《孟兰盆经》作疏,亦或称“赞述”。就像慧净或作“惠净”一样,这两部书中所载“惠沼”应即“慧沼”。

慧沼,也作“惠沼”,日本佐伯定胤、中野达慧编《玄奘三藏师资传丛书》卷下载唐李邕《唐故白马寺主翻译惠沼神塔碑并序》云:“和尚讳玄,字惠沼。俗姓刘氏,彭城人也。曾祖秦,随音州北海县宰,因家住淄川。……年十有二,即求出俗。……咸亨三年,服膺长安基、光二师。……又撰《能断》、《般若》、《金光明□》、《孟兰盆》、《温室》等经疏、《惠日》、《论了义灯》等凡六十卷,所翻经律论等三百馀轴,盛行于代。”^②宋赞宁《宋高僧传》卷二义解篇第二云:“(沼)善达翻传。自奘三藏到京,恒窥壶奥。后亲大乘基师,更加精博。及菩提流志于崇福寺译《大宝积经》,沼预其选,充证义。……初沼证义于义净译场,多所刊正。……后著诸疏义,号淄州沼也。”由上记述可知,慧沼为淄州大云寺僧,擅长佛经翻译,曾随玄奘精研佛典。咸亨三年(672),奉窥基为师。曾先后参与义净、菩提流志译场,充证义,撰有《法华玄赞义决》、《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因明义断》、《因明入正理论义纂要》、《劝发菩提心集》、《能显中边慧日论》、《唯识了义灯》、《仁王般若经疏》、《金刚般若经疏》、《孟兰盆经疏》等。

从慧沼生平看,他曾随玄奘习学,擅长译经,在译场主要充证义。这与前文所论法藏本《孟兰盆经赞述》疏解经义的特点颇为吻合。如法藏本多援引玄奘所译《佛地论》及其它佛典如《阿含经》、《涅槃经》、《智度论》、《末罗经》等证义,这与他善于翻传、常在译场充“证义”正好相合;又如法藏本疏解经文结构及翻译用语多用三藏法师新译经、论中所用新词,这正是因为慧沼曾随玄奘

①“上下生”指《弥勒上生经》和《弥勒下生经》。

②承梁春胜博士惠示:隋北海县属青州,句中“音州”的“音”疑为“青”之讹。

法师精研佛典所致。

另,在慧沼撰《劝发菩提心集》卷下“施器及饮食得十功德门”云:“器皿饮食各得十功德,如《孟兰盆经赞述》说,不能繁叙也。”言施“器皿饮食”所获功德,已在《孟兰盆经赞述》中论说,此不详叙。这是慧沼对他前后所著两书中相关内容彼此关联、参照的解说。检法藏本《赞述》,在“具饭百味五果、汲灌盆器、香油铤(铤)烛、床卧众具,尽施甘美,贮在盆中”下疏云:“此第三示法也。‘具饭百味五果’者,昼(尽)所献之肴;‘汲灌盆器’穷殍食之神器;‘香油铤(铤)烛’拟去暗以留光;‘床卧众具’则止疲以息虑。然则盆由圣制,事藉功成,所以安汲灌于龙门;设[铤]燎于庙室;秦镜则皎之于前,赵玉亦佩之于后。神凤上踊,飞盖下垂;翻瑛八珍,盆罗百味。檀那既就福应时,□庶拔擢于弘恩,亦佑利于群品也。”(144-150行)这段文字正是慧沼在《孟兰盆经赞述》中对施“器皿饮食”所获功德的详细阐述。

由此不难推知,法藏本《赞述》当为慧沼所撰。如此,前人所谓法藏本乃慧净撰著的观点也就不能成立了,与之相关的论述也当移位到慧沼身上。

三

前文已论,上图本《赞述》乃慧净所作,而法藏本《赞述》实为慧沼撰著。然荒见泰史却认为上图本《赞述》是有人假托慧净之名在宗密《疏》的基础上改编成的,理由是上图本中有不少内容摘抄自宗密《疏》,就像是它的节略本一样。此说恐怕不能成立。

首先,慧净著有《孟兰盆经赞述》,在其传记及相关的佛典目录中都有明确的记载,上图本《赞述》也清楚地题为“沙门慧净法师制”,这是不可轻易否定的。

其次,慧净《赞述》较宗密《疏》早得多,宗密作《疏》应曾参考过慧净的《赞述》。如果其中确有部分内容近似,则应当是宗密《疏》摘引慧净《赞述》的字句。笔者曾将上图本《赞述》与宗密《疏》的内容逐一进行比对,发现凡宗密《疏》中提及“三藏”云的话语,大都与上图本《赞述》的内容近似。《疏》中提及“三藏”者总计13条,其中第1条用的是全称“义净三藏”。那么,我们能否就凭此“义净”二字就说其中引用了义净(635-713)的话,进而推论上图本《赞述》不可能是慧净所作呢?这恐怕不够稳妥。因为遍检文献,皆未见义净撰有关于《孟兰盆经》“赞述”或“疏”之类的著作。而且,宗密《疏》中提及“三藏”的13条《孟兰盆经》的疏释中,有12条是援引“三藏”的疏文及译文,1条是批评“三藏”错会文意,故作异释,不可信从。如此有针对性的说法,每一条都能在上图本《赞述》中找到相关的字句。如其中一条为:“三藏云:纵汝感天灵于上界,激地祇于下方。纵摄邪魔,横罗外道,统六合以同一家,总八部以为一众,并其神力,亦不奈何。”这段话在上图本《赞述》中作:“纵汝感天灵于上,激地祇于下;纵括邪魔,横罗外道,统六合以同家,总八部为一众,尽其神力,亦不能奈何。”(65-67行)两者内容全同,仅文字上作了些增改,即将《赞

述》里的“上、下、括、家、为、尽、不能”等分别改成了“上界、下方、摄、一家、以为、并不”，宗密《疏》源出上图本《赞述》的痕迹，一目了然。此外，宗密《疏》中所引“三藏云”的话，多是四六交错、对仗工整、含义隽永的经典词句。它们能得到宗密的青睐而引入《疏》中，大概也是因为慧净所作《赞述》“文义绮密，高彦推之”的缘故。值得注意的是，在宋代有关《孟兰盆经》的注疏中，有同时引用慧净《赞述》与宗密《疏》的内容，如宋遵式述、慧观重编《金园集》卷上修孟兰盆方法九门之“造盆正法第二”下云：“慧净三藏云：‘汝须物华四事（一房舍、二衣服、三饮食、四汤药），盆美八珍（食之米面、味之盐醋、果之果柰、菜之芥姜）。’密师疏云：‘不必雕镂金玉、剪割缛彩、高耸栏架等也（诚奢）。’”^①其中所引“慧净三藏”云“汝须物华四事，盆美八珍”，也见于宗密《疏》中所引“三藏云”之语。由此可见，宗密《疏》中所谓“三藏”实指慧净三藏。其中首次出现的“义净三藏云”的“义净”很有可能是“慧净”之误，就像前引合肥龚钊在上图本跋语中将“慧净”误作“义净”一样，此“义净”也完全可能是“慧净”之误。因为宋代元照曾明确指出宗密《疏》中的“三藏”即“慧净三藏”，唐宗密疏、宋元照记《孟兰盆经疏新记》卷下：“【疏】故三藏科云‘摧恻’，释云：感激彻于骨髓，号叫动于天地。【记】三藏即慧净三藏。旧疏科为‘摧恻’往救，所以今疏不依用者，以经文语简，但曰‘悲哀’，科须贴经，故易之耳。然犹可证碎身等义，故复引之。”此谓慧净旧疏将经文“目连悲哀”科为“摧恻”，为宗密新疏所不取，乃因经文仅言“悲哀”，须与经文贴切，故而改之。但元照认为慧净疏文可助证“碎身”之义，因此又引之于“记”中。可见，宗密《疏》中所谓“三藏”其实指的就是慧净，其所引“三藏云”之语皆源于慧净所著《孟兰盆经赞述》。

仔细比勘上图本《赞述》与宗密《疏》中相关的内容，我们发现其中个别字句略有不同。如《赞述》中“而况在父母，义高山岳，是以系仰顾腹之恩，思答劬劳之重”，《疏》中改成了“父母义高天地，恩深巨海，是以系仰顾腹之恩，思答劬劳之德”；《赞述》中“必假多丝之力；一人不能救厄，亦藉众圣之威”，《疏》中改成了“必假多丝；一人不能除业，必资众德”；《赞述》中“能速如斯”，《疏》改成了“速疾如斯”；《赞述》中“孝子答恩，理年年不得绝”，《疏》改作“孝子报恩，须年年不绝供”等。很明显，这些改动乃宗密有意为之。因为如此改写后，表达更简练明白，对仗也更工整了。

第三，慧净所作经疏“文义绮密，高彦推之”，这只要读一下上图本《赞述》开首一段“释题”之文，即可信服其说。文曰：“‘佛说孟兰盆经’者，夫以第一义谛，筌蹄阂其纶绪；不二法门，系像忘其表迹。然则契之者必同其本，化之者或异其流。所以弥陀种觉，居妙刹以弘道；释迦能仁，处娑婆以接物。斯由

^①句中“果之果柰”的后一“果”字当是“李”的误字。宋元照《孟兰盆经疏新记》即作“果之李柰”，是其证。

净土之内，根熟易调；秽国之中，刚强难化。故开三乘以运四生，设四轮而摧八难；烛无明之巨夜，济生死之深河。为导为洲，是归是救。佛有弟子，厥号目连，变极六通，神凝九定，怀恩罔思，报逾深[□]。痛慈母于幽关，仰至灵于善逝，爰创启请，肇建斯经。是以无上慈父，有灵斯应，皎三明而像秋月，震四辩而类春雷，赞胜境以示良田，美孝慈而开胜行。颂自我口，畅之彼心，以觉合机，故称‘佛说’。‘孟兰’是西域之语，此曰倒悬；‘盆’乃东夏之音，仍为救器。若随方俗，应曰‘救倒悬盆’。斯由尊者之亲，魂沉闇道，载饥且渴，命似倒悬，纵圣子威灵，无拯涂炭。佛令盆罗百只，式贡三尊，仰大众之恩光，救倒悬之窘急。即从此事，以制经名。经有五义，略举二条：一曰涌泉，二称绳墨。涌泉则注而无竭，此义可以目常；绳墨乃楷定正邪，兹理即当其法，故曰‘佛说孟兰盆经’。”（2-14行）这段文字四六交错，文辞绮丽典雅，内容丰富，结构谨严，既有对“佛说孟兰盆经”的赞叹，又有对经文内容的阐述，还有对专名“孟兰盆”及该经得名之由的解释，更有对经文义理的总结。衡之以道宣所言“文义缜密”，可谓正得其实。

综上所述，上图本《赞述》乃慧净所撰，或谓其为后人据宗密《疏》改编节略而成的观点，恐不可从。相反，宗密《疏》中倒是引用了不少慧净《赞述》的内容。也就是说，慧净《赞述》对宗密《疏》有着较大的影响。

作者工作单位：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

·书讯·

澳大利亚藏太平天国原刻官书丛刊（全三册）

精装 16 开 定价：1800 元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年 7 月

太平天国原刻官书，当时称诏书，上盖天王金印及“旨准”两字，印制精美，因太平天国失败而被清廷大量销毁，存世极少，向为研究者所重视。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所藏部分，系由太平天国赠送给法、英外交官、传教士，后为“伦敦会藏书”。本书全三册，收录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所藏太平天国原版刻书和原抄本 23 种，原版布告 3 种，原抄布告 6 种。其中《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为存世孤本，而《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新历》亦是世界唯一重刻本。附录一册，全彩仿真印刷该馆秘藏的三件原版安民告示，这三件布告保存完好、字迹清晰、朱墨分明、色彩鲜艳、宛如新制，其中的两件更是世界仅存之硕果。本书由原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知名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郭存孝先生亲自到澳馆核查版本并撰写提要。